

訪顏元叔先生

博士、雜文作家、系主任

心岱

楔子

民國三十八年是歷史上沉痛的轉捩點，不少中國人在這時候顛沛流離，痛失骨肉，比較幸運的得以跟隨政府，舉家播遷臺灣，更有如我一般甫睡進母親的懷抱，尚不知這人間充滿了憂患的初生嬰孩。

時間給每個生命刻下不同的戳記，時間也給人們相識相知的機會，正如此刻，我面對着躍進中年的

顏元叔先生，誰又相信我和他在那個年代——三十八年——同時初臨海島，呼吸一樣的空气，蹂躪一樣的泥土，只是當時我還渾沌無知，而他正值青春年華。我的眼前彷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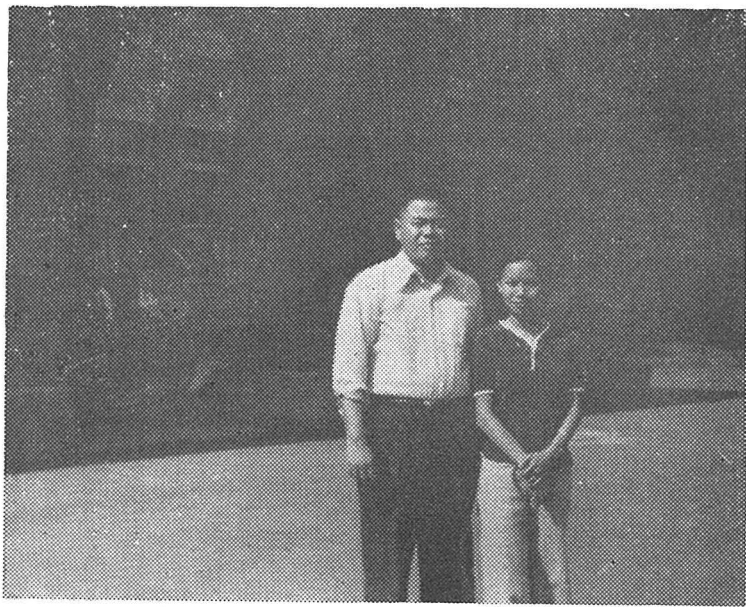
跳過一抹恍惚，在流失的時光裏，重重疊疊的插映了這位少年的成長、苦學——

民國二十二年，出生於南京的他，剛學穩脚步，可以走出母親的懷抱，可以跑出天井宅院，去看他

想看的，世界，玩他想玩的東西時，日本人的戰火却掩漫了大好江山，奪去了寧靜歡笑。

父親往重慶共赴國難，他隨着母親避到家鄉湖南茶陵縣的水頭村。這段農村生活使他成長、健壯，根植了爾後鮮明的懷想和永恒的記憶。

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南京唸初中，升高一的時候，遭逢匪禍，於是又走避家鄉，在縣城的省立第二



顏叔元教授與作文作者合影

中學繼續唸書。不到一年，只學期多一點，他們學家遷到臺灣，首先考進臺北工業職業學校——現在的臺北工專，唸電機科，唸了一年發現不合興趣，便插班到建國中學唸高二。

臺灣，彷彿是他的故鄉，他們一家居住淡水河畔，父親解甲歸田，以種菜、養豬為生，使他重溫孩提時水頭村的農家生活，在唸書之餘，菜圃和豬欄裏的活兒，一直是他最樂意作的。

民國四十一年，建中畢業，他投考臺大、師範學院、臺中農學院、淡江英專等四個學校，都錄取了，他於是選擇第一志願，進入臺大外文系，開始步向他理想的里程。

四年大學、服兵役，而後他就飛往異邦，在美國呆了六個年頭，或求學，或執教，直到一九六六年

拿到了英國文學博士的學位，便回到母校外文系執教並兼系主任至今。

由童稚而少年，而青年，從南京到茶陵，到臺北，甚至到美國，多少困頓、輾轉、不安，更不知多少寒窗苦讀的歲月。然而這些代價是無止境的，如今的他是學生所愛戴敬仰的嚴師，是文壇上舉足輕重的學者——

像銅器擊出的聲音，低沉，却又帶着金屬特有鏗鏘的昂然。他說着，一雙手始終插在風衣的袋裏，在敘述自己的過去時，偶爾他眯起眼睛，細算一下年代時間，似乎它們馬不停蹄，毫無休憩的過去，委實教他有些兒木然。他沒有說得很詳細，只約略提供一份年表，可是我能臆測，可以體會，這種直覺就像從一幅畫中的空白處得來的。

濃眉、方臉，他看來是那樣厚實，豐饒的頭髮、渾圓的肚圍，樣樣是屬於鄉下的，泥土氣的厚實。很難說他不是個嚴肅的人，他的神情是一派書生的沉着，不常笑，可是笑的時候，必定開懷大笑，這時候難免表露了他開朗、可親的一面。

於是我們很輕鬆的談將起來。

一

一開始，我就先問他，像他這麼「中國」的一位學人，怎麼會走上比較文學的路呢？他說：

我回來的時候主要先教英國文學和外國文學。不過，任何一個中國人在讀外國文學的時候，都會感覺到，就像我當時在威斯康辛大學唸博士學位時，常有爲什麼花那麼多精力、時間去研究外國文學，而

不用來研究我們中國文學的這種感慨，但已走上了這條路，就把它唸完。所以對中國人來說，唸了外國文學，然後使我感覺到對中國文學應該有所涉獵，能够把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做某種程度的相提並論，這是一種很自然的趨勢。很多人這樣，不僅是唸比較文學的人才如此，可以說這是一種不能避免的趨勢，你是中國人，了解中國語文，能唸中國書，就不免想到把你研究的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結合起來，這種心意或意識，本身當然是比較文學的形影。

那麼比較文學是怎麼回事？

有了這種認識後，再來說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我所教的是英國文學，使我覺得有把英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結合的必要。在我做了系主任

任之後，便把外文系設一個中國文學史必修課，開十二個學分，這是希望我們同學們對中國文學先有一個好的基礎。

在一九七〇年的時候，我在淡江西洋文學研究室裏作研究工作，淡江學院院長張建邦先生希望能辦一個文學性的刊物，我與朱立民先生商量的結果，認為這份文學刊物能够在國際上有其特殊性、突破性，就應該辦一個比較文學性的雜誌，特別是比較中國跟外國的文學。

當時便出版了「淡江文學評論」(Tamkang Review)。一九七一年淡江學院又辦了第一次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一九七二年開始在臺大成立了比較文學博士班，目前有八個學生。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間我在臺大外文系辦了「中外文學」月刊，它

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提倡中西或中外比較文學的研究，當然其他的我們也很重視。

今年八月間我們要辦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這一次是由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主持，淡江文理學院主辦。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是三年前成立的，結合了全國多數大專院校的中文系外文系的教授和研究生的，有二百多位會員，兩年來我們做了好幾次演講，總是請一位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用他們不同的觀點來談同一個問題，同學們反應都很熱烈。

這些工作我們要一直做下去，它的目標宗旨是不斷的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擺在一起同時考慮，使中國文學能够列入世界文學之林。當然，中國文學在外國學者作

家的研究之中，也做了同樣的工作，不過我們總覺得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常會有他們的偏見，所以我們希望能够在臺灣以我們自己中國人的觀點來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相提並論，這樣可以建立起中國式或中國觀點的一種比較文學。

比如外國人看我們中國的章回小說，覺得很機械，沒什麼深意，沒什麼了不起，但假使從各個部份的觀點來看，章回小說也有它的好處，這個好處不是西洋小說所有的。

又如外國人看中國人的詩，經常有很多偏見和誤解，或者外國人翻譯了中國的古典詩，那翻譯的錯誤、差勁，實在太多了；翻譯當然也是屬於比較文學的一門。

我們希望能造成一批中國的學者，開拓一塊中國人研究比較文學

的園地，能確定我們中國人在比較文學方面的地位、力量和方法、方針。要做到這個程度，老是滯留在中國文學裏面是做不到的，必須要有西洋文學或外國文學的知識，當然也得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如此結合在一起，才能為中國文學做一點世界性的工作。

比較文學早期在歐洲的發展時，研究的題目、對象只限於在同一國家同一文學體系的不同發展。比如說歐洲是一個體系，因為它從希臘羅馬發展而來，那麼從這系統發展下來的各個國家就產生相近的文學上的淵源和影響。歐洲人認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範圍限於淵源有關係的研究，雖然超越國家，但仍有相互的淵源關係。

二次大戰後，比較文學傳到美國，美國人則認為除了研究淵源有

關係的文學作品之外，應再包括沒有淵源關係的不同體系的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於是中國的古典文學跟歐洲的古典文學或現代文學顯然沒有什麼淵源關係、影響，但這個也可以拿來研究。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文學看成一個淵源，影響到亞洲各國，甚至印度，這個關係也可成立成研究的一部份。我們更同意美國人提倡的沒有關係、淵源的不同國家文學研究，這可以說是現在的比較文學的一個重心。

在臺灣以及在美國研究比較文學的中國人有很重要的一個特殊點，就是拿西洋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拿西洋的文學觀點來研究中國文學。

我個人作的一些比較文學也是應用西洋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古典詩

；把古典詩整個結構、意象做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同樣的中文系的柯慶明也在做類似的工作，還有樂衛軍，他是以西洋的觀點來談中國的神話。

拿西洋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有很多人認為沒道理。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學，西洋方法是西洋方法，怎麼能拿西洋方法西洋觀點壓在中國文學上面呢。

我想這裏面有個根本的認識，那就是說全世界的文學應該是一樣的，就像全世界的人是一樣的，人心同然，雖然我們文學有不同的面貌，本質上應該是一樣或差不多。因此這個方法能研究那種文學，也一樣可以研究這種文學。

的確，以世界上實際的成果看起來，用西洋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也有很好的成果，這個成果不僅是

比用舊方法、傳統方法好，而且是很特殊的，這個成果不是用舊方法所能得到的。因為我們把中國文學看成一個完整的結構，就像一隻杯子、一個具體的物體，也可以說像個彫刻像、藝術品，這完整的個體你從各個方向去看它，可以看出不同的面貌；從上面看是上面看到的印象；從下面看又是下面的印象。用不同的觀點得到不同的結果。

比如說中國的舊詩，大家都覺得很美。但是當拿西洋的所謂細讀法，也就是新批評來讀中國舊詩，會發現中國的舊詩、古典詩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意象的詩，它的字質特別稠密，就我個人看來，英國詩或美國詩一定是比不上的，就是莎士比亞的詩也比不上中國古典詩意象、字質的稠密。

要得到這個了解，就非要用那

個方法來看才看得出來，如果是從中國傳統方法來看，只知很美很好，說不出什麼道理。直到你把中國詩和西洋詩擺在一起才看得出它的特點，這特點是外國所沒有的。

最近看到柯慶明在「幼獅」發表的一篇文章，談「中國幾首古典民謠、古詩的結構問題」，他認為中國古詩裏面有一個「正反合」的結構，「辯證法」的結構，任何一首四行詩都有個「主題」、「反主題」、「綜合主題」。當然這個觀點是從西洋哲學觀點得來的，他拿來解釋一些古詩，雖不一定很對，但也頗有道理，使人非常感興趣，尤其他說日本的俳句就不像中國古詩的「正反合」結構，它是一個最簡單的「陳述」，「青蛙跳到池裏」，這麼一句話，給你一個簡單的「視景」。這視景也許很優雅，

有很深刻的反照，但中國詩因有「正反合」的結構，它可以包括更廣泛的人生。所以他認為日本的俳句是單純的一種透視，中國詩則可以容納更複雜的人生。這是這位年青人很有見地的看法。

那麼這些看法都需要從西洋觀點來證明，非一般傳統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覺得有些人太本位主義，太固步自封，總認為中國的東西我已研究得很透徹，放在懷裏就够了，你不要碰它，碰它就是冒犯了它，這樣缺乏「比較研究」，只知己，不知彼，只能守，不能出門，中國文學自難受到世人普遍的，以及深入的瞭解重視和仰慕。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來剖析幾首詩，有人便反駁，認為中國女人不會像我所

說的那樣性感、好色、誨淫，這是偏狹之論。中國女人在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固然很含蓄，但內在是跟任何人一樣的，對男女之間自然也有她的慾望。我就以李益的江南曲做解釋：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姑不論我當時寫的是對或不對，但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文學是博大的、偉大的、完整的，那它一定能承受各種不同的看法，以各種不同的看法得到各種不同的結果，這些結果就能證明中國文學內容是那麼豐富，那麼多樣性，因此更能顯出中國文學的偉大、博大。正如莎士比亞，英國人看它偉大，中國人用中國人的觀點也覺得它偉大，從十八世紀看它偉大，從二十世紀看也覺得偉大。因為它是那

麼豐富，即使是以不同的時代觀點來看，它都能給你不同的面貌。我相信中國古典詩應該是有這個能耐，不是說能忍受各種看法的打擊，而是它需要各種看法來發掘它的豐富。

當然中國詩也有它的短處，如西洋詩裏面有很多敘事詩，而中國詩則很少。這些短處也要發掘出來。也就是說敢把中國文學擺入世界文學之林，跟人家一較長短。

我們可以想像比較文學在溝通中西文化上是有其重要的地位，更是中國文學進軍世界的大道，同時也將是中國人吸收外國文學的一盞意識明燈，但應該從何處着手去做呢？

這個非要思想開放，知識要相當的淵博、廣泛。這些能力不是一

個人可以兼有，所以我們就透過各種組織，把中國文學學者和外國文學結合一起。

目前我們做的還不多，只是個開始，希望能影響越來越大。「淡江文學評論」的出版已經在國際上有它的地位，很多重要的國際書目、期刊都收了淡江評論裏的論文題目。「中外文學」在國際上當然也有它的地位，但因它是中文的，外國人看不懂，可是在有中國人的地方已相當普遍。

有些西洋人誤解要研究中國文學必須得到日本去，到京都去。這是指我們這邊沒有人才，還是沒有圖書？

這真是一句令人痛心的話。當然這不算是誤解，而是成了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日本人才多，圖書

整理得有條理有次序。也的確，聽說在日本，特別是京都，他們所做的漢學研究很不錯。不過說研究中國學問要到外國去，這是一件令我們很痛心的事，我們希望能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強調中國文學跟外國文學方面盡一份力量，使臺灣成爲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世界中心。

我們站在文學崗位上的人，不能做別的，就應盡本崗位的責任，希望中國文學在國際文壇能爭取一席之地。

我們相信這些刊物的出版，這些活動都做得還不錯，不過總覺得國內的響應支援是不够的。辦「中外文學」，虧損很大，到處請人家支援，人家也不理會，中國人似乎對這種事不大熱衷。

大家都知道，銷路是一本刊物

生存的依據，儘管身爲讀者的我表示了對「中外文學」這份純文學性的刊物的關切，可是誰能真正分擔其負責人對「銷路」的苦衷？

目前「中外文學」的長期訂戶約有一千五百份，零售一千本左右。這本刊物要銷到五千本才够本錢，所以每期虧損很大。

可以這麼說，國內不論公家或私人，不是沒有錢，有錢的人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有錢，錢跟能力不能結合在一塊，就形成很多浪費，這浪費是兩方面的，金錢方面和能力方面，也就是說能幹的人受到了金錢財物的限制，無法發揮他的能力。

我們做這工作，完全是個人的熱誠，我們覺得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公家，對這種事的鼓勵太少了，我們做這件事整個的成果也就是整個

社會、整個國家的成果，但社會國家對我們却沒有一分的幫助，或說幫助得很小。比如有些機構，一期買一百本或買個十本，這完全是點綴而已。

毫無疑問的，在自由中國的雜誌中，「中外文學」的水準應是首屈一指，無論是文藝批評方面或是文學創作方面。可是這份刊物的財務却是危機重重，但我們相信還可以拼下去。

假使臺大的同學們或是中外文學系裏的同學，每人都能訂一份，那不是很可觀了嗎？顏先生似乎笑我的天真，呵呵地說：

這是不可能的，我所說的社會上，當然也包括了我們自己這些學生，他們對這份刊物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熱衷，或是對這本刊物的目的

熱衷。不過還好，在校門口的「博士書店」，每期都能賣上兩百多本，是全臺北市銷路最好的一個攤位，可以想到買的大都是臺大學生。

是否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刊物的水準，水準太高，以致影響銷路？

這當然是對的，但我們國家需要高水準的讀物。有錢的人、有錢的機構就應該給予支持，他們應該知道，這樣的投資所得到的收穫是一個更大的收穫，是一個非金錢式的文化的收穫。

今天跑到國外出，到國外的圖書館一看，全是大陸的刊物。

如果說我們有幾本像樣的高水準刊物，人家一翻，覺得值得訂閱，可以擺一本在書架上，這無形的給我們國家爭取一分榮譽、力量。

在美國、在歐洲重要的圖書館裏，聽說看不到一本來自中華民國的雜誌。

我認為國家做宣傳，應該在內容具有學術性或者有其超越價值的東西。人家看了之後，知道是中華民國的雜誌，是中華民國某個大學出版的，或是社會上那個學者作家所寫的文章，他們認為很有價值。使他們感覺到中華民國在文學文化方面還是相當活躍。這個後果才是真正達到了宣傳的目的。

我們國內的雜誌很多，五花八門，很熱鬧，但在國外却相當寂寞、消沉。這怎麼不使我們感慨遺憾呢？

二

治學、教學、辦雜誌，他一人身兼數職，却還能經常在報章雜誌

上讀到他的文章，怎不令人欽佩，我請他談談他的寫作方向：

我寫得最少的是短篇小說，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曾修過短篇小說的寫作課。寫過一些，也曾到臺灣發表幾篇，我覺得短篇小說寫起來很費時間、很花腦筋，所以產量很少。寫得多一點的是文學評論，對這一方面取決的題目是一陣一陣的。有時候我對中國現代新詩很感興趣，一連寫了好幾篇有關的評論，後來興趣轉移到中國古典詩趣。

接着，興趣好像轉向雜文。雜文已寫了有兩年，開始慢慢淡了，看下一步興趣轉到那一方面吧。當然，文學評論方面應該繼續寫，而且要多寫。

常聽說：臺灣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

鄉愿觀念，只敢講好，不敢得罪朋友，只好趨于一面倒。另外也有瞎起開的方式，亂叫亂罵，往往不是把一個作者壓下去，就是反把他捧出了名，如何才能把文學批評做得公正嚴謹，不偏不阿？

顏先生專心致力於比較文學，而比較文學涵蓋了文藝批評，說到這，他沉思了一會。文評的困擾，彼此都深具同感。

公正的文學批評當然不同於書評。嚴格的說，書評是介紹書和內容，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故事、什麼內容，書評家稍為介紹、推薦一下。

書評家可以稱是泛讀人，他不一定要深入，在美國紐約有一位很有名的書評家費迪曼，據說一本「戰爭與和平」，他四小時之內可以看完。

而批評家應該是更深一步看到各種問題。因此書評是媒介，它可以說是處於批評的前面，它可以為書本、文學推廣，使讀者對書本有所認識，或者選擇。

文學批評就是讀者選擇了書，或說看了書之後，他想知道人家對這本書的評價如何，他就去讀有關文學批評方面的文章，同時他可以對這本書的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這份工作在臺灣的文學工作者，是一致期望能做得很好的，可是這裏面實在有很多困擾，原因是臺灣地方小，住得太擠，大家見面機會太多，朋友太多。我剛回國那幾年，對臺灣的文壇接觸不深，能够放手去寫。七八年來，說真的，有時候覺得難免有人際關係上的牽扯。

假使說你只從事文學批評的工作，不做系主任，不做任何其他的工作，那你可以完全憑你的文學良心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但你做了一名行政工作者，牽涉到一些人事關係後，必然有些顧慮。

現在我個人比別人的顧慮要少，但還是有。我相信我仍有能力從事文學批評的工作，勇氣也許沒有從前的旺，但如果我可以擺脫一些職務，相信勇氣還是可以培養，不過也要看我的興趣，假如我能專向這一方面，我還是敢痛痛快快的談。

目前報章、雜誌一再提倡，呼籲文學批評。但都只是口頭上的提倡。他們要求適合他們的批評，而不是客觀性的文學批評，其實他們何嘗不想開放一點，可想而知他們也一樣的因為牽涉到人際關係。就

我個人遭遇到的：比如某個人寫一篇批評我的文章寄到報紙或雜誌去，他們收到後就先寄給我看，徵求我的同意，免得冒犯了人，他們這麼謹慎的處理，當然是爲了人際的關係。

我們的文壇對名氣，大家都看得太嚴重、太嚴肅了，名氣好比生命一樣，不能有一點點的損傷。當然人總是人啦，會覺得人家說你不好，是受了傷害，但我以爲自己應該收斂一點。

顏先生治學的虔誠、教學的認真是大家所共知的，他不但專力於比較文學方面的著作，翻譯一系列的作品，還不時有創作問世。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自然連想起這兩年來不斷發表的那些雜文。

他的雜文深入了讀者廣大的讀

者羣，轟動一時。我問他：您認爲這主要的是不是因爲您以輕鬆的取材和筆調來處理它們的緣故，像你這種表現方式恰好達到了「雅俗共賞」，這是您最初的動機嗎？也有些人士認爲他們不够深刻，流于輕浮。當您看到了別人對您的作品所下的批評，您的態度和感覺如何：

我寫的雜文受到人家很多責罵，常有人寫信來罵我。最近更有罵我寫「參觀經濟建設」的雜文，說我寫得那麼膚淺，不過是拍馬屁的文章而已。

但我們知道，這一兩年來世界的經濟萎縮、危難，而經濟建設可能是我們自己唯一拯救的道路。寫信來的大概是一名年輕大學生，他也許不知道這些利害關係，如果我們的經濟崩潰了，那就無所依靠了，除非你認爲你不願活在這個政

體下，假使你認爲今天中華民國臺灣的政體是值得活下去的話，你還想活在這個政體下，你就該知道這些關係的重要性。

我個人絕不是如那位年青人說的拍馬屁，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多印證，而且我們知道什麼是是非。

當然這幾篇談經濟建設的文章不是專向某些人獻媚、恭維的，這是我們大家的成就，應該是每個人的成就，是大家的願望，也是每個人的願望。有些年青人不懂整個的關係，總認爲你說政府好就有問題，他們當然希望我寫些諷刺、罵人的文章，看了過癮，但應該諷刺、應該罵的我自然會寫，不應該諷刺、不應該罵的當然不能寫，人總要憑良心做事。難道說建曾文水庫不是好的事情？難道說建高速公路不

是好的事情？

我寫了雜文之後，發現一般人說我們讀者的水準很低，不能接受高水準的東西，這是很誤解的說法。

我的雜文我自己認為水準很高，却有很多讀者喜愛，且能引起他們的感應，可見這些人在某一方面的水準並不算低。

我常收到很多女讀者的來信；一般家庭主婦平時所讀的大部份是一些風花雪月之類，對我那些酸甜苦辣的東西能引起共鳴，這表示她們的閱讀水準並不低，只是說在沒有別的東西可讀的時候，那些小說自然可以用來消遣，如果你給她們提高一點，她們還是照樣接受，因此我們的讀者羣並不像我們一般人說的那樣低，沒有往上爬的可能性。他們也有要高水準的胃口，只是

你沒有東西給他而已。

我寫雜文，很希望能夠把我們臺灣這一千六百萬人的苦悶、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恐懼和希望表現出來。

我想我的雜文使有些讀者感到興趣，也許是因為文體的輕鬆。有人認為我寫的不過是些芝麻綠豆小事，但日常最接近的東西往往被人忽視，芝麻綠豆裏也可看出天地。這是不同人眼光的看法得到不同的結論。

最近這方面寫得較多，談嚴肅的東西仍然每期在「中文文學」都有，報紙上也發表一些研究性的東西。

我相信我寫雜文的文體是下過一番功夫的。葉維廉曾說過一句話：

「反正以後要談散文的人，絕

對不能忽略了你的『人間煙火』。」「這句話他是說得很客氣，也說得很恰當，我相信。

這種文體完全是我人格的迸發，我也花了很大心思去修改。當然一般人看起來，認為很流利、很輕快，這流利輕快是經過很大的心計的。

我敢說，我的雜文是我一部份的成就，我還要繼續的寫，我認為這些雜文，無論是觀點，是情感的發洩，都不是膚淺的、個人的，而都跟這時代有關。

我們談論到目前文壇作家們寫作的趨勢，我特別注意到顏先生的「民族文學」。

談「民族文學」的當然不止顏先生一人，但比較文學來看「民族文學」他有他獨特之見。

關於寫作趨勢與民族文學兩者，顏先生說出了他個人的見解。

我認為小說方面還是要走社會寫實路線，因為任何文學作品，很顯然的，與生命結合的文學就可長生起來，脫離社會生活就會枯萎。

這方面可以看得出來的，是月前中國時報人間的小說大展上所發表的一些小說，有些年輕作家很能夠領略這個意思。我很希望我們的小說家都能朝這方面走，這也是我們「中外文學」所提倡的社會寫實主義。

文學有生命的結合，不僅可以肯定社會寫實的重要，此外我們今天的社會需要文學的發掘，文學是社會意識的一個開拓者，也是社會意識的塑造者，塑造開拓之後才使人能認識這個社會，了解社會的實質如何，這必須透過文學。所以文學

能使我們認識人生、認識時代，沒有文學作品，人們等於活在苦悶中。

就像我們談民族文學，它包括一個民族所創造的一切文學，無論好文學或壞文學。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它包括詩經，也應包括武俠小說，因為它們對於我國民族文化之形成，皆有或多或少的貢獻。如何創造民族文學，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並非一念之間可以言得失的事。要創造民族文學，先要有民族意識，所謂民族意識，當然不是僅屬於古遠的事情，譬如「水滸傳」或「紅樓夢」的人情風土；也不局限於懷舊之幽情，寫些江南江北的鄉土小說；民族意識就在當前的中國人生活中，要發掘就在當今發掘。但是要了解當今也應了解古遠；民族意識是一種歷史的源流，源流的任何一段與其前後是不可分的。因此，

要追求民族意識，要有溯流而上的努力，也要有順流而下的從容。假何我們肯下工夫，而不依附在外國思潮的影響下，我們也許能發掘什麼是純粹的中國性，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意識，則民族文學有了生長的基礎。

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文藝工作者發掘出來的、塑造出來的。民族性不是光說在那裏，用文字去發掘就够了的，我們要一面發掘，一面刻劃才行。

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是對當前時空的一種刻劃，當前時空的刻劃累積之後，就變成當前的一種民族文學。

詩也是走同樣的路線。目前已有少數詩人領略了這種意識。只有這樣才能使詩真正把握生命，使詩本身充滿活力。

本刊自七月一日起，爲文化出版界提供更多的服務

，特將本刊廣告價格降低，新訂價格如下：

封底（彩色）	全頁	六〇〇〇元
封面裏	全頁	六〇〇〇元
封底裏	全頁	四〇〇〇元
首頁	全頁	二五〇〇元
內頁	全頁	一二〇〇元
內頁	半頁	六〇〇元
補白		三〇〇元
文化窗分格廣告每格		六〇〇元

如蒙惠顧

請撥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

散文方面，在臺灣一般人有些

誤解，認爲散文一定要很美，是屬於女性之美。陰性之美，不能算是柔和美。電影也如此，標題啦、演員啦都一樣。他們把這些飄渺、膚淺的東西灌輸到讀者觀衆身上，使這些人也變得非常飄渺、膚淺了。

無論詩、散文、小說，我都要求具備一種堅強的生命感，這種充滿魄力的生命感，不僅要在思想上表現，也要在文體上表現。

尾聲

鄰着走廊，聽聞校園那「傳鐘」已響過了幾回。我欠身告別，走出顏先生小小的寫字間，這一刻的駐留曾使兩個相異的人生躍出時空的距離，作了心靈與理想的契合，這份契合將成爲我心和筆間的連繫。

一九七五、五、十三